



丁燕所写的非虚构文学作品,为什么在当下文学界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?首先是因为她涉及到了重大题材。她所写下的非虚构作品,既有涉及大自然主题和环境保护主题的,如《沙孜湖》,也有贴近个人体验,从女性角度观察自身和世相的《孕妇周记》《双重生活》等,而她真正对中国加入全球化这一进程有文学上的书写贡献的,是她将视线投放到珠江三角洲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社会性题材《工厂女孩》《工厂男孩》。这两本书的横空出世,构成了她在当下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亮点,也是她自身非虚构创作强有力的三大支点之一。

中国追赶现代化的步伐、规模与方式已令世界瞩目。新时代的种种特征,演化趋势,以及它所带来的新的戏剧冲突,都是以往的书写不曾面对,当然也未能表述的,在2013年出版了《工厂女孩》后,丁燕于2016年5月出版了《工厂男孩》,她将视线投放到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男工的生存状态,以亲历者的探访,作家的情怀,铭记下她所目睹到的风起云涌或暗淡幽微,描绘出新生代产业工人历尽沧桑的人生百态和心路历程。《工厂男孩》是一次直面新时代的新尝试。这也是一部能留给未来,并可能被未来所回顾及重视的非虚构佳作。

在《工厂男孩》一书中,丁燕向读者描述了一幅尖锐的东莞城市肖像——关于衰退和发展、关于破坏和重建、关于伤痛和希冀。她用她对东莞这座城市的诚恳,描述了这座城市如何膨胀式发展,又如何自我修复。在她看来,东莞是中国最具戏剧性色彩的城市,也是被污名化最严重的城市,其风格

诗歌仍要坚持大众道路

诗歌贵在言、意、象、境和风格的深入。读人民日报社援藏干部吴冰的诗歌,我由衷有了一些感叹。

一、语言平实自如,服从于艺术目标

依据一般常识,我们个人在不同时候不同场合需用不同的语言模式。比如两个亲密的人在一起,严格的语言形式不重要,大家既相互熟悉,又心灵相近,语言只在会意,忌呆板,要求灵活多变,碰撞出无穷的灵气和意蕴。无需冗长和一般顺序的主谓宾,只言片语、颠倒逻辑均可。但我们在表达一个大众的话题,尤其是个人向社会表达,如同在讲台上向一些不同阶层、不同背景的文化个体宣讲,或者在表达一个复杂的话题,在杂乱无章中挖掘或者整理出某个有序时,我们的语言需要平实、易懂,千万不能用歪歪曲曲、晦涩的语言阻碍火山般的情感、大彻大悟的思想。

诗歌在很多情况下要对日常语言进行变形。但诗歌绝不排斥不变形的语言,即平常的生活语言。万变不离其宗,变形的语言无不以平实的语言为基础。语言形式的变幻服从于艺术目标,不能为变而变,当变则变,不当变则不变。吴冰的诗歌言艺术即体现了这种恰到好处。很多时候语言大变形。如《这是最美的秋天》:柔软的花瓣/撑起迎冬的伞/没有鸟的天空飘满/绝望的面孔。很多时候又回归语言的质朴。比如《驻村干部》:仿佛万只鸟儿展开翅膀/突然飞进五千个村庄。

二、意象新颖,意境厚重

吴冰的诗歌和西藏另一位诗人丁勇一样,在诗歌意象上有自己的创新。其实诗歌象的创新建立于意的创新。首先,没有新意的象是没有生命力的,不能进入诗歌的殿堂。其次,由意指象,自然世界纷繁复杂,象由心决,该选什么作象由心意决定在先。吴冰走上高高的青藏高原后,爱国情怀、民族情怀、为民情怀、社会情怀不断被激发出来,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意识境界里,他捕捉到了大量以前诗句中所没有捕捉过的意象。

青少年时代在家乡时,吴冰笔下的意象更多是大河、石桥、葡萄藤、麦草堆。几十年后吴冰笔下涌出了冰川、喜马拉雅生长的声音、测量蓝天的雄鹰、藏羚羊和野驴的疾蹄、溅飞鹰衣的格桑花、登山者攀登的姿势……吴冰对意象的创新显示了娴熟的诗歌技巧。

吴冰诗歌意境厚重,有青藏高原般的神化。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,境生于象而超乎象。象是个体的,只有境才是整体的。象是零散的,只有境才能整合它。象要求丰富多彩,但境要求整齐划一。象可以是凡世和尘俗的,但境必须是有界有层次有超脱的。象可以是具体的,但境必须是虚幻的或者说理想化的。在大量西藏具体可感的象上,吴冰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大量青藏高原意境。

三、风格既显个性,又不失社会和人文关怀

诗歌可以写个人,但无论是写自己还是写他人,是写小私还是写大社会,都只是方法方式的不同,无关大要。最关键的还在于写作所聚集的能量、所产出的能量、所净化的能量、所影响的能量。社会大众生活已经非常忙碌,生计已经非常艰辛,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使他们们几近殚精竭虑,作为精神产品,需要给人们更多以轻松和闲适,以更多的社会希望,以更多的积极向上的力量。读吴冰的诗歌,我看到了充分的社会正能量,这才是当今诗坛我们应走的内容风格大道。

是诗歌升华了人生,还是新生活不断推进了更高的诗歌境界?吴冰的诗歌在不断地发生风格转换,滚烫的诗心也在不断地进化之中,体现出不同时代的风格特点。在皖南,吴冰的诗歌是用长江的水浇灌出来的,少年同学时代激昂文字,挥斥方遒。在南海,在广州的车水马龙中,吴冰的诗歌是用珠三角世界工厂的水磨出的,青年时代既抒怀抱负,也散发各种复杂的时代情绪。但自从上了青藏高原,在圣城拉萨,吴冰诗歌的素材由水变成了火,由江变成了蓝天白云,由平原变成了高山,由偏于一隅取材变成了从可窥视天下可纵论古今的世界屋脊取材,中年援藏再次勃发出诗歌的灿烂芳华,从平地到屋脊,取得了诗歌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。

四、作品在开放的西藏扎根,在蓝天白云下传唱

西藏的文化正变得越来越开放,不仅活跃着大批藏族作家,也活跃着一群群居藏的汉族作家,还有近年群体不断扩大的藏漂作家,一个开放性的文化氛围正在形成。吴冰作为一名来藏时间不长的内地作家,凭着自己的勤奋创作,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,获得了西藏自治区文艺界的广泛认可和欢迎。

最应该被倾听的人群

□邱华栋

类同西部片,其成长饱受争议。然而,30多年来,东莞以“海纳百川”之胸怀,让无数打工者汇聚于此。这些打工群体的困惑与无奈,爱与情仇,如万花筒里的璀璨碎片,复杂多变、难以预测,但又意义深远。以直面的方式目睹打工者的生存现状,引发了丁燕的惊叹与沉思,促她记录下她所目睹到的当下。纵观全书可知,让她始终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,是发展大潮中人如何维护其个体之尊严。

描述打工群体的题材虽然写实,但却并不讨喜。要让读者愿意打开书读下去,并且在读的时候付出同情心的理解,作家要不断地引导,以自己的生命经验和诚意作为引子才行。真要做到这一点,其实并非易事。从2014年年初至2015年年末,丁燕盘桓在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上,将这里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。在她看来,也许出现在这里的问题,正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之所在。

珠江三角洲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的工厂男孩之遭遇,是当下中国底层青年命运的缩影和隐喻吗?我们了解他们的感受吗?我们知道他们的挣扎吗?他们在国家的文化生产中缺席,但这并不表明他们不存在——他们以沉默的方式出现着。这些男孩多为留守儿童,在松散的状态下野生野长。他们大多不会种地,对土地不像父辈那样眷恋,也没有城市生活经验,不懂得储蓄,虽然能因不顺心而跳槽,但却因频繁换厂,根本存不下钱。当进入车间工作时,他们又要遵守层层训诫,这让他们生出强烈的“断裂感”。

另一个可怕的现实浮出水面:在工厂帝国,男性的地位明显低于女性。没有爱情,没有稳定收入,和父辈有着深刻隔阂,缺乏医疗保障,这一切,都是男工们所面临的问题。他们蜗居大城市缝隙却又无法留在这里,但也一时回不到乡村,变成了“四不像”,一个悬浮的阶级。

虽然关于工厂和车间的影像,似乎已尽人皆知,但其内部蕴藏的秘密,却为大多数人所不知。《工厂男孩》以详尽的一手调查,以浓郁的文学笔触,细致地勾勒出一个个感人的生命故事,并对这些事和这些人进行精到分析,对“最广大的沉默之群体”的情感状态、生命要求及内在的社会逻辑进行了全景式的探讨,让读者了解到农民工不只是悲情的一群,他们也在努力抗争、适度调整、奋勇开拓,试图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命运。

《工厂男孩》所展现出的技法与魄力是毋庸置疑的。丁燕以诗人的情感,小说家的技巧、人类学家的眼光再现了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特殊生活,而那些褶皱深处的细节,通过她的描述变得栩栩如生、引人入胜。丁燕的行文似乎保持着一种古典的平衡和清晰,其叙述分外客观、冷静又细致,充满了刀锋般的速度和力量。整本书像一个瑰丽澎湃的立体剧场,每一个独立篇章又像是一场激情演出,而那些场景所编织出的悲喜剧则令读者既惊叹又惋惜!

时间帮助了丁燕,让她得以慢慢厘清工厂路,观察到这条街的秘密,目睹到母与子的战争,亲历了学生工的抗争,参与到那群给“女神”打电话的男工群体中……凡此种种,像张上下勾连的大网,廓清了工厂帝国中青年男工的多维度生活场景。而这,也注定了《工厂男孩》和那种走马观花、隔靴搔痒式的写作完全不同。在这本书中,人性的、善的和温暖的因素,艰辛的、挣扎的和自我奋斗的叙说,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爱的归属的故事完美地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时代交响中最激越的一章。

丁燕来自自西北新疆,南北兼容的背景为其提供了多样化的观察方法。这个背景与她两年的耐心相结合,让她在整理满坑满谷的素材碎片时,生出纵横的想象力,不仅将各类碎片黏合,且重新塑形并赋予其新的灵魂。在创作实践中,她似乎已寻找到了一种独属于她个人的表达方式——既保持典雅的文学性又不失鲜活的原生态。她的观点从来不是口号式的规范陈述,而是有血有肉,充满生活气息的描述。她似乎从不带预设的情绪,也从从不将生活现场简单地二元对立化,而力图在条分缕析中,将各种乱麻般的难题一一梳理,提纲挈领地揭示出来。

丁燕带着社会批判和革新的愿景,但却并不拘泥于理论窠臼,而以灵活变动的目光,密切盯视生活现场,提炼鲜活细节。《工厂男孩》异常好读,其原因也许正在于这本书里没有说教。扎实的田野调查让丁燕的文字以丰厚的实证带出理论再造的可能。通过对场景和人物的描述,她将作家内在的倾向性表达了出来,她的深度和力度,则隐含在她的叙述中。而一部有真知灼见的著作,也许正在于对真实生活的体味和解读,让思想冲出藩篱,在现实中寻找到土壤和水,扎根于大地上。这本书也证明了像丁燕这样的作家,也许可以更快、更有效地指出问题之所在。

现在,我们已深刻地认识到,单靠传统的经验已不可能给激变中国以更多解释。我们发现,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协调个体与整体的关系,整体亦很难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。也许,为青年产业工人寻找历史定位的时刻已然来到。而在这样的时候,丁燕的新作《工厂男孩》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——虽然生存举步维艰,然而,个性张扬的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男工却不服僵化管理,勇于探索生活可能,以人性的方式反对异化,为过上独立、自由、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。他们是新工人阶层的雏形,也是未来中国之希望,所以他们的声音最应该被聆听。

每一个个体生命尽管都有其自身的挣扎、奋进和苦乐,但生命本身都是值得尊重的。人生总是在平凡中绽放出善和爱 的花朵。丁燕做到了以平等的眼光注视他者,以时光的尺度丈量生命,以作家的情怀描述生活,并记录下那些他者的面孔如花朵般绽放的璀璨瞬间。

我怀着惶恐的心情,以20年时间为北洋军阀时期10个风云人物写出了300余万言的传记。所以这样做,一是觉得这段历史有它的特殊性,这是中国从封建制度向民主共和转轨时期,是历史的大转折,人物的本性必然会特别鲜明;二是觉得这些人并没有死心踏地效忠清王朝、直接与革命党为敌,而是自我消耗殆尽,对社会的大变革,反而起到有益的作用。应该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肯定他们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正在县政协机关主持文史资料研究工作。我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,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文史资料选辑》上关于北洋事件和人物文章,基本上都搜集并阅读一遍。这一努力,使得我对“北洋”为阵地的创作方向更坚定了。

为北洋风云人物立传,按照初步掌握的材料,我决定重点围绕10个人思考:袁世凯,皖系段祺瑞、徐树铮,直系曹锟、吴佩孚、孙传芳,奉系张作霖、张宗昌,再加上晚清遗老徐世昌和张勋。人物框定之后,便觉得创作素材不够。比如,派系之间的恩仇渊源,引起纷争的原因,人物之间的瓜葛以及人物出生地的地域状况、风土人情、生活习惯、语言风格以及本人性格等等,都感到苍白;另外还有,别人文章中提到的电文、函件,多为“摘要”,不是原件。这都要大体了解。于是,我便趁工作之便或利用节假日去做这方面的采访、搜集工作。经过五六年的努力,到了1987年,总算基本掌握了一些。之后,我便开始了对文章结构的思考。

这时候我产生了顾虑:为北洋人物立传,那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。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?我在“文革”中是严重受害者,曾有10多年牢狱之苦,心有余悸。但是,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年,又舍不得放弃。于是,我决定先写一点中短篇,去投石探路。我写的第一篇中篇是《北洋怪杰徐树铮》,大约3万字。不敢在本省发表,投给了江西省的文学杂志《星火》。不想,该杂志竟于1988年7月号发表在头条上。后来我又写了《徐州梦——张勋复辟》《吴佩孚死那年》《混世魔王张宗昌》《徐世昌大总统升沉记》和《段祺瑞借刀》等多个中篇,先后在《名人传记》《花径》《大风》等杂志发表,并且获得了较好的评论。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。

我是1990年开始进入北洋人物长篇创作的。原来计划依照《三国演义》的形式,写上中下三卷集的《北洋演义》。后来想想,觉得不行。我的创作思路是:尊重历史,还人物以真实面目。我不想戏说自己的作品。文学作品标上“历史”的标签,就得对历史负责,绝不可以混说历史。我只好以史实为据,为历史人物写传记。在对人物的塑造上,我尽可能撇开政治结

“北洋”一梦二十年

□董 尧

创作思路确定之后,我便一边继续搜集材料,一边写作。经过将近3年的努力,写出了徐树铮、吴佩孚、张作霖三人的传记,共100万字。当我稍作喘息的时候,我又想起了“文革”的伤痛,生怕拿出来之后被人无限上纲,罗织罪名,再陷困境。直到1994年末,才将三部稿子寄给北京的“团结出版社”。1995年7月,团结出版社将这三部纳入“民国风云秘录丛书”,分别以《北洋怪杰徐树铮》《北洋枭雄张作霖》和《北洋军阀吴佩孚》的书名同时出版。不久,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等报刊先后为三部书出版发表专文或消息。接下来,我便按照计划,潜下心来,对其余7人进行创作。

我是1991年底办理的离休手续,可以全力投入北洋人物创作上面去。到1999年6月,北洋10大人物 的传记完全脱稿,共约300万字。他们分别是袁世凯、段祺瑞、徐树铮、徐世昌、吴佩孚、曹锟、张勋、张宗昌、孙传芳和张作霖。算起来,这10本书从动议到初稿完成,整整经过了19年又3个月的漫长时间。

北洋人物的创作远非上述所谈那样顺畅,中间风波多起,困难重重,每次都弄得我几乎放弃。前期碰到的困难是精神压力,选择了这个主题似乎就错了,连亲朋好友都认为“这是一条险道”,劝我改换主题;真正创作起来,又感到对史料和人物把握不准,边采访边创作太吃力,又几乎放弃。

长时期以来,写光明,颂工农兵,似乎是作家们的惟一主题。就是那样,许多作家还被上纲上纲打入另册。选择一群北洋人物,岂不自讨苦吃。有两件事给我精神压力颇大:一件是,我的一位朋友看了我的“袁世凯”初稿跟我断交了;他是一位中学历史高级教师,他问我“为什么不顺着‘窃国大盗’这个主题写,反而写了一些他的作为?”这位朋友拂袖而去,从此再登门。还有一件事是,在我开始写作不久,一家报纸的记者知道了,觉得要为10个军阀写传,有新闻价值,便上门来采访,要我为写篇人物专访。我告诉他,我没有时间接待。”这位记者非抢先不可,竟自上门。我无可奈何,便停下笔,用一天多时间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。1个多月之后,记者打来电话,告知稿子未被通过。说审稿人认为“写了一群坏人的人,不可表扬!”我十分吃惊!因为写“坏人”我也成了坏人。

除上文说到的压力之外,每一个要写的人都有多面性,如何秉笔?这便是难题。还有一些难点:大多史料上只记下了他们的从政从军情况,对于他们的家庭状况记得很少,这是我花费精力最多的地方,但不能不做。

写北洋,固然是写史,而写史,只是构造骨架,要有血肉,就离不开人物。写人物,属人文一脉,这个方面,比写史更难。因为要写尽人的性格,写透人的灵魂,本身已经不容易,却又不能跟史实相左,所以写起来,颇有些戴着镣铐跳舞的意思。也就是说,要把人写活,又得顾虑历史的牵绊,加之北洋历史长期以来,多为史学界的意识形态史观所诟病,特别是像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这样倒行逆施的行迹,更是早已被打入历史的另册。因而,想要写出人物的丰富复杂,想要重新展开和重估那些历史和人物,谈何容易。董老师自然清楚知道难处所在,但是他还是甘之如飴坚持写。他的出发点跟一般的写史写人不一样,不是简单地摹写历史,也没有做概述性的价值判断,而是侧重“风云”,写的是历史的“故事”,且往往跌宕起伏一路发展,尤其是写人物,写出其中的身世情感,立意生动细腻,其中最为强调的,是人心、人性、人格,以文学和史传的方式,重新赋予时代和人物以丰富的状貌。尤其是虚构出了诸多的历史细节,以形成完整的叙事序列。如是这般的写法,虽然面临着虚构历史所带来的夸大/窄化的风险,但需要指出的是,历史演义本身就在于侧重故事性与可读性,呈现历史饱满的细部,令历史立体而生动。除此之外,董老师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,他对历史史料的掌握,以及对真实历史的恪守。在真实与虚构之间,在历史与叙事之间,构筑起了坚实可靠却又生动的北洋史,而写北洋人物,也能在风云变幻之中,可信而不失可爱。例如,他写的“北洋之虎”段祺瑞,从段在困顿之际到北方寻找出路开始,到投奔袁世凯,尔后成为北洋政府的掌权者,一度位高权重;然而,“直皖一战老袁衰了”一章,写了段祺瑞的人生转折,尤为精彩。原本飞扬跋扈的“段合肥”,在兵败直皖战争之后,沉郁悲愤的内心跃然纸上。可以说,董尧写段祺瑞,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的“人心”:既有掌权北洋军阀的野心,也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心;既有即位北洋政府总理的政治雄心,也有军事败北、政坛陨落之后的困恼之心。

写人物,在于激活历史,核心在于人物怎么写,在这个过程中,聚焦人性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。董尧先生写北洋,写风云人物,既能写出大开大阖之情势,也不疏漏点滴细微的人性。相比起高无常的历史关头,人性的细微累积,更能堆叠出生命的起伏。在董尧先生笔下,北洋时代最受人非议的袁世凯,却也有其之善,缘自他的小站练兵,擅采德系军法,令北洋军队走向现代化,他与清政府复杂微妙的关系,又在客观上保护和承认了辛亥革命,保住了革命的果实;然而,他的私欲和野心,将他一步步推向权力的顶端,又使他渐渐坠入了罪恶的深渊,终至灭身之灾。袁世凯固然有其骄横跋扈、篡权倒退的一面,但又不可抹杀其在客观上对辛亥革命起到的正面作用,尤其是在他面对帝制时的欲望和纠葛,呈现出了一个可悲可叹的北洋风云人物。历史便诚如这般的耐人寻味,在难以评说、无法定调的地方,便是文学可以入笔和着调之处,特别是幽微细腻的人性,往往更能折射出历史的吊诡和繁杂。

在《北洋风云人物》中,徐世昌应该是文武兼修的典范。董尧着重刻画了一个较为多面的北洋人物:在1906年主政东北成为“东北王”之际,兴办经济、发展实业、鼓励种植畜牧,主张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东北;在生死存亡之际,挽救南北危局,促成南北和平,并始终为中华之和平鼓与吹;1937年日本侵略中华,他横眉冷对汉奸的威逼利诱,对侵略者及其爪牙嗤之以鼻并愤而抗击;除此之外,徐世昌在学问著述上,同样令人瞩目,编著了《清儒学案》《退耕堂集》《水竹村人集》等杂炙人口并为后人传颂的经典。董尧所立意刻画的是一个具有人格精神的人物形象。这样的形象在北洋历史中,并不多见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

历史人物不好写,北洋历史人物尤其不好写。治史写史,面对悬而未决的时代、尚未定论的人物,容易误人或一叶障目,或厚彼薄此的历史圈套;而基调已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人物,同样会由于条条框框所难以突破。譬如北洋时代,四方混战,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将其定为军阀无义战,也即枭雄崛起的年代,尊崇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,权力与欲望、传统与现代之间,厮杀争夺,代表着历史前进过程中的曲折。因而,其中风云人物尤其对那段历史有影响的人物,虽说骁勇善战、谋略过人、事功卓著,但是在道义、进步、现代的传统观念下,难觅可取之处,甚至需要重新接受历史的裁决和批判。所以,史家也好,作家也好,往往避之犹恐不及。

但是,董尧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,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头钻入北洋历史堆中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史料收集和文学写作。他一做就是数十年,先后积累了4000多万字的历史和人物素材,并于1991年荣休之后开始写作。前后创作了《北洋风云人物》系列纪实文学作品10部,包括袁世凯、段祺瑞、曹锟、徐树铮、张作霖、吴佩孚、张宗昌、孙传芳、张勋、徐世昌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。

写北洋,固然是写史,而写史,只是构造骨架,要有血肉,就离不开人物。写人物,属人文一脉,这个方面,比写史更难。因为要写尽人的性格,写透人的灵魂,本身已经不容易,却又不能跟史实相左,所以写起来,颇有些戴着镣铐跳舞的意思。也就是说,要把人写活,又得顾虑历史的牵绊,加之北洋历史长期以来,多为史学界的意识形态史观所诟病,特别是像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这样倒行逆施的行迹,更是早已被打入历史的另册。因而,想要写出人物的丰富复杂,想要重新展开和重估那些历史和人物,谈何容易。董老师自然清楚知道难处所在,但是他还是甘之如飴坚持写。他的出发点跟一般的写史写人不一样,不是简单地摹写历史,也没有做概述性的价值判断,而是侧重“风云”,写的是历史的“故事”,且往往跌宕起伏一路发展,尤其是写人物,写出其中的身世情感,立意生动细腻,其中最为强调的,是人心、人性、人格,以文学和史传的方式,重新赋予时代和人物以丰富的状貌。尤其是虚构出了诸多的历史细节,以形成完整的叙事序列。如是这般的写法,虽然面临着虚构历史所带来的夸大/窄化的风险,但需要指出的是,历史演义本身就在于侧重故事性与可读性,呈现历史饱满的细部,令历史立体而生动。除此之外,董老师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,他对历史史料的掌握,以及对真实历史的恪守。在真实与虚构之间,在历史与叙事之间,构筑起了坚实可靠却又生动的北洋史,而写北洋人物,也能在风云变幻之中,可信而不失可爱。例如,他写的“北洋之虎”段祺瑞,从段在困顿之际到北方寻找出路开始,到投奔袁世凯,尔后成为北洋政府的掌权者,一度位高权重;然而,“直皖一战老袁衰了”一章,写了段祺瑞的人生转折,尤为精彩。原本飞扬跋扈的“段合肥”,在兵败直皖战争之后,沉郁悲愤的内心跃然纸上。可以说,董尧写段祺瑞,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的“人心”:既有掌权北洋军阀的野心,也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心;既有即位北洋政府总理的政治雄心,也有军事败北、政坛陨落之后的困恼之心。

写人物,在于激活历史,核心在于人物怎么写,在这个过程中,聚焦人性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。董尧先生写北洋,写风云人物,既能写出大开大阖之情势,也不疏漏点滴细微的人性。相比起高无常的历史关头,人性的细微累积,更能堆叠出生命的起伏。在董尧先生笔下,北洋时代最受人非议的袁世凯,却也有其之善,缘自他的小站练兵,擅采德系军法,令北洋军队走向现代化,他与清政府复杂微妙的关系,又在客观上保护和承认了辛亥革命,保住了革命的果实;然而,他的私欲和野心,将他一步步推向权力的顶端,又使他渐渐坠入了罪恶的深渊,终至灭身之灾。袁世凯固然有其骄横跋扈、篡权倒退的一面,但又不可抹杀其在客观上对辛亥革命起到的正面作用,尤其是在他面对帝制时的欲望和纠葛,呈现出了一个可悲可叹的北洋风云人物。历史便诚如这般的耐人寻味,在难以评说、无法定调的地方,便是文学可以入笔和着调之处,特别是幽微细腻的人性,往往更能折射出历史的吊诡和繁杂。

在《北洋风云人物》中,徐世昌应该是文武兼修的典范。董尧着重刻画了一个较为多面的北洋人物:在1906年主政东北成为“东北王”之际,兴办经济、发展实业、鼓励种植畜牧,主张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东北;在生死存亡之际,挽救南北危局,促成南北和平,并始终为中华之和平鼓与吹;1937年日本侵略中华,他横眉冷对汉奸的威逼利诱,对侵略者及其爪牙嗤之以鼻并愤而抗击;除此之外,徐世昌在学问著述上,同样令人瞩目,编著了《清儒学案》《退耕堂集》《水竹村人集》等杂炙人口并为后人传颂的经典。董尧所立意刻画的是一个具有人格精神的人物形象。这样的形象在北洋历史中,并不多见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历史是人写的。这个“人”怎样写历史,历史也会赋予这个“人”在历史中的位置。董尧先生选择北洋历史,选了这10个人物,用了20多年时间,从人心与历史、人性与历史、人格与历史等多个方面揭示人物命运,让读者看清北洋风云人物的真实形象,既具备清晰完备的史料价值,同时也彰显出丰富立体的文学内涵,给广大读者以深远的启迪。可以说是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。

北洋历史人物创作的新突破

□王昕朋